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序

吕元礼教授自 2000 年以来发表了多篇有关新加坡政治文化和政府体制的论文。《新加坡为什么能?》这部书是吕教授多年研究的心得集成。

我在去年阅读了吕教授的一篇讨论新加坡如何长期保持廉政的评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文章。吕教授文字精炼,又富洞察力,短短几行字,就概括了我们积累经年的治国方略。他对新加坡体制入微的观察,贯穿全书,为想了解新加坡的读者提供有用的参照。

吕教授在书中凸显新加坡独特和可取的一面。俗语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新加坡人读此书,也可获益,可以了解国家现有的一切得来不易,非理所当然的。就如吕教授在书中所述,无论是清廉和有效率的政府,团结和谐的社会,以及安宁和清洁的环境,都是辛勤耕耘,周详策划和有效实施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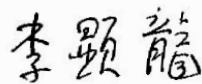
然而,如吕教授所指出的,新加坡并非完美无缺。我们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我们发展的模式也非放诸四海皆准的。四十多年来,新加坡领袖和人民齐心建国。我们借鉴他人经验,择取其良策,也从错

误中学习,不断改进。我们乐于分享经验,但是也深感自己的不足,许多方面离完善还远。此外,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际地位,新加坡经验难免有其局限性。以新中两国来说,国情相差甚大。新加坡地小,历史短浅。中国地大物博,人口约为新加坡的三百倍,而且拥有 5000 年悠久文明和源远流长的政治和学术传统。

全球化的趋势,日新月异的科技,正加速人类社会的变化。为求生存和发展,所有国家都得寻找全新对策。为了与时俱进,发展方向和心态的改变,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丢弃那些价值永恒的政策和道德观念。

新加坡完全沉浸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必须重新打造,才能成为全球网络的一个高效枢纽:一个四通八达又能为世界增值的国家。我们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策略,以保持新加坡独特的优势,确保这个岛国继续拥有优秀的政府,以便为下一代带来美好的生活。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吕教授和其他研究社会模型与政治体系的学者,才有理由继续观察新加坡的发展。

新加坡总理

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Lee Hsien Loong in black ink on a light-colored rectangular background.

目 录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序	1
-------------	---

上 卷

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廉洁？

上卷引言	1
------------	---

活力篇

第一章 理性执政：带来变通力、稳定力	10
第一节 变通力：以实用理性为基础	10
一、关心常理：不是拘泥于主义	12
二、关心现实生活：不是拘泥于经典理论	14
三、关心做法上正确：不是拘泥于“政治上正确”	14
四、关心客观实际：不是拘泥于意识形态	17
第二节 稳定力：以渐进理性、实践理性为基础	19
一、渐进理性：演化而成的制度比设计而成的制度更优秀	20
二、实践理性：姓“社”姓“资”“让下一代去决定”	23
第二章 “托管”执政：带来公信力、代表力	28
第一节 公信力：以有限的竞争性选举为基础	29
一、有限的竞争：一党优势下的多党并存竞争	31
二、选举：从严意义的秘密投票	38

第二节	代表力:以代议政治为基础	45
一、	加强服务性:接见民众和访问选民	46
二、	提高兼容性:设置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	57
三、	增进和合性:设立“影子内阁”的设想	59
第三章	依法执政:带来法治力、权威力	61
第一节	权威力:以“定此名分”为基础	62
一、	维护职位权威:“明确地设下‘超越范围’的记号”	62
二、	维护法理权威:“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法定的长官”	66
第二节	法治力:以“控名责实”为基础	68
一、	依法治官:不仅打“苍蝇”,而且打“老虎”	68
二、	依法治言:“李光耀是全球最好诉讼的政治家之一”	73
第四章	为民执政:带来扎根力、竞争力	78
第一节	扎根力:以依靠人民的“民有”为基础	80
一、	民有恒产:实现时间意义的扎根力	80
二、	基层组织:实现空间意义的扎根力	85
第二节	竞争力:以服务人民的“民享”为基础	91
一、“	好政府”理念:应对两党制诉求	92
二、“	地方政府”选举策略:应对“补选”策略	102
第五章	贤能执政:带来领导力、更新力	106
第一节	领导力:以精英政治为基础	107
一、	好政府的关键:“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	107
二、	领袖特质:品性、动机、人格、意识	110
三、	基因决定论:天赋素质更能决定人的智力与能力	115
四、	发掘人才:“猎人”、识人和选人	121
第二节	更新力:以自我更新为基础	133
一、	自我更新的主动性:在夕阳西斜的余晖中提供旭日东升的远景	133
二、	选择领袖的“自行性”:领袖不应该指定继承人	137
三、	权力更替的有序性:独一无二的权力转移模式	140
四、	退位安排的妥善性:有养、有为、有尊、有慰、有安	145
五、	权力交接的“为公”性:“必须抱着利他主义”	150

第六章	强人执政:带来管制力、约束力	158
第一节	管制力:以为民做主为基础	160
	一、管制的原则:“要受人尊重,不要讨人喜欢”	161
	二、管制的根据:政府是“必要的善”	164
	三、管制的手段:挥舞“大棒子”	170
	四、管制的作风:家长式作风	173
第二节	约束力:以“负责任”的原则为基础	180
	一、“负责任”的涵义:对事实、社会责任	181
	二、“负责任”的原则:有节制的权力和建设性的态度	188

廉洁篇

第七章	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	196
第一节	发扬传统:倡导儒家核心价值	198
	一、提倡儒家道德:忠于国与耻于贪	199
	二、强调君子执政:“置个人利益于社会之上是小人行径”	208
第二节	净化环境:建设廉洁政治文化	219
	一、白衣白裤:人民行动党“党服”	220
	二、低调俭朴:人民行动党总部	223
	三、以身作则:国家领导人创设廉洁榜样	228
第八章	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	233
第一节	正视现实:抱持诚实的态度	235
	一、诚实看待人性:既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	235
	二、诚实看待时代变化:正视、理解和适应变化	238
	三、诚实看待政治:既是让人献身的事业,也是养家糊口的职业	242
	四、诚实看待收入差距:要机会平等,不要结果绝对平等	244
第二节	实事求是:采取市场的做法	247
	一、根据人才价值确定薪金:“物有所值”,“才有所值”	249
	二、根据供求状况确定薪金:“能力和报酬之间并没有抽象的‘公平’关系”	252
	三、根据收益确定薪金:“便宜没有好政府”	257

第九章	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	260
第一节	规定严密;减少机会和设防堵洞	260
	一、减少机会的规定;釜底抽薪	261
	二、步步设防的规定;密不容针	264
	三、堵塞漏洞的规定;无空可钻	269
第二节	权力制衡;推行民选总统制度	271
	一、扩大民选总统的职权;让总统有权制约内阁	271
	二、发挥民选总统的作用;替国家安装一个安全锁头	275
第十章	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	278
第一节	铁帚扫贪;建设贪污调查机构	278
	一、贪污调查局的来历;取缔收取“咖啡钱”	279
	二、贪污调查局的职权;直接听从总理(或总统)调度	282
	三、贪污调查局工作方式;举报立案,风闻出击	285
	四、贪污调查局的工作作风;无私、迅速、透明	287
第二节	铁腕护廉;施行严明严厉法律	294
	一、立法严明;财产超过收入所得又不能解释,视为受贿	294
	二、执法严厉;有罪必惩,轻罪重惩	297

下 卷

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

上卷引言

1999年，时值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45周年之际。有关文献没有交代当时场景的气氛，也没有描述谈话双方的表情。但是，透过那本白皮纪念册中“与领袖对谈”的栏目标题，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决非放浪散漫——因为谈话的对象毕竟是执政党的“领袖”，可以想见双方的表情也无拘谨局促——因为谈话的性质毕竟是朋友式的“对谈”。翻过占据了整整一个页面的栏目标题，凸入眼帘的第一位领袖是“李光耀”。这的确是一个光彩耀目的名字，名如其人。无须交代，空气中一定还有史诗般的凝重；不必描述，神情里必然蕴涵雕像似的冷峻。当然，随着年岁渐高，李光耀的脸上也会写上慈祥，刻下和蔼。这是漫长政治生涯磨合出来的圆融境地，是无数政治斗争打造出来的中和境界。儒家经典描状的“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①的圣贤风貌，中华先人推崇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②的君子风度，正是眼前这位老人的仪容气象。也正是这番“对谈”的如下首个回合，引发

出笔者对于本卷的创作冲动——

①《论语·述而》。

②《论语·子张》。



1994年2月19日,李光耀为翻新后的中峇鲁联络所主持开幕仪式时,接受居民赠送的“光耀邦国”横匾。见《李光耀图片集》第180页。

记者的提问十分直截了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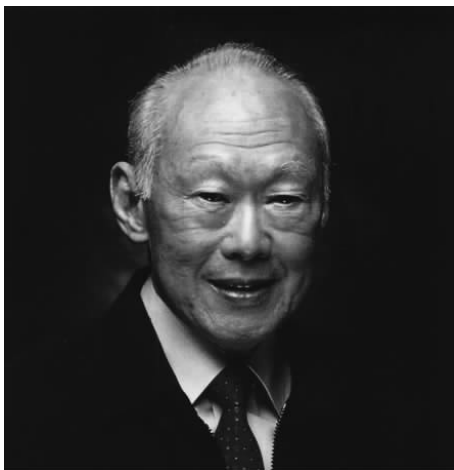
身为人民行动党创党人,依你看行动党在过去四十五年里最大的成绩是什么?

李光耀的回答更是无容置疑:

行动党最大的成就是掌握政权四十年,并保持其活力和诚实,而不是成为衰落和贪污的政党。年轻的领袖和干部掌管行动党,他们继续坚信应通过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来改善全体新加坡人民的生活。^①

的确,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最为显著特征是一党长期执政,即在多个政党并存竞争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连续赢得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新加坡政治文明的举世瞩目成就是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活力和廉洁,即在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

^①《人民行动党(1954-1999)》第132页。



透露出慈祥、和蔼的李光耀。见《李光耀 80 名言》第 104 页。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同时，成功地治理了被称作“东南亚之癌”的贪污腐败，从而在政府廉洁程度方面被国际权威调研机构连年评为亚洲第一、世界前茅^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上述政党政治特征下所取得的上述政治文明成就，特别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一方面，相对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轮流执政模式，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模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②的模式具有某种相似性，从而使得该党的成功经验较为便于借鉴；另一方面，相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的腐败、衰落以及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政权的局势，长期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却始终保持活力和廉洁，其骄人成绩又使得该党的成功经验十分值得借鉴。李光耀曾说：“将来改变中国的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不是美

^①在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全球竞争力评比中，新加坡多次排名第一；在国际管理机构主办的世界竞争力评比中，新加坡多次排名第二。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国际透明度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个权威的独立机构，它每年都定期发表贪污现象指数及全球贪污情况报告。截止到 2005 年为止，新加坡连续十一年成为进入该组织的廉洁排行榜前十名的亚洲唯一经济体。从 1995 年至今，新加坡的排名介于第三至第九。以 2004 年为例，该组织发表的贪污现象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给新加坡的打分是 9.3 分，排名第五。该年进入最廉洁经济体排行榜前十名的依序是芬兰、新西兰、丹麦和冰岛（并列第三）、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洲和荷兰。

^②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在总统府举行的晚宴上，李光耀与邓小平碰杯。见《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第 77 页。

国人、欧洲人、日本人或新加坡人。他们当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会站出来，纵目观察世界，找出应予学习的榜样，也就是一个有教养的民族。他们一旦看到这样的社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说：‘我们应当效法！’”^①这里，李光耀并没有替中国指明那个“应予学习的榜样”；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却向中国人民指出了那个“应当借鉴”的对象。邓小平在 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②

①《李资政：中国变强国尚需时间 中国人思维也须改变》，2002 年 2 月 17 日《联合早报》。

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8-37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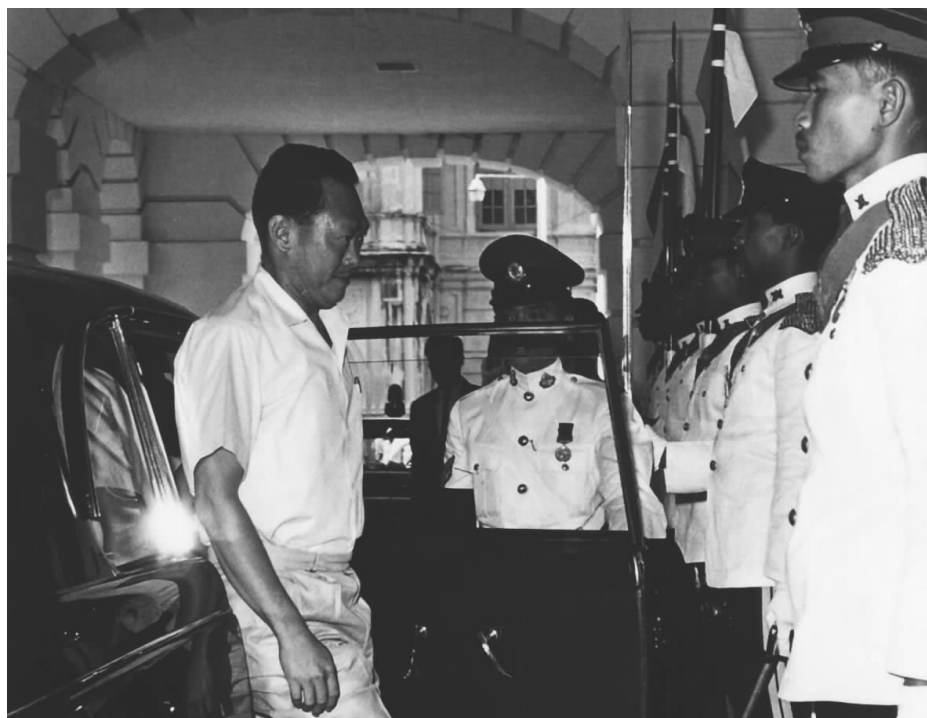
邓小平似乎随口道来的上述谈话，实际上包含着并不随意的三方面内容：热忱称赞新加坡，强调借鉴新加坡，要求赶超新加坡。

首先，邓小平热忱称赞新加坡，是经过实地考察之后的由衷感叹。邓小平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曾路过新加坡。1978年，他又以中国领导人的身份访问新加坡，第二次踏上了这片土地。这让他亲身感受了新加坡的巨大变化，亲眼看到了新加坡的建设成就。在新加坡访问时，他与李光耀共进晚餐。面对眼前这位成功地领导了中国以外的另外一个以华人为主体国家的华人总理，邓小平说：“恭喜你，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上一回我是途经新加坡，到法国的马塞尔去留学，当时这里非常落后，现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其次，邓小平强调借鉴新加坡，是1978年访问新加坡之后的一贯思想。就在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新加坡这个其政府经常被极左时期的中国媒体批评谩骂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家，转而被中国报纸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也就在邓小平访新归来的第二个月（当年12月），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其中，邓小平对



“光辉灿烂带来国家繁荣富强，耀古烁今留给世代永恒基业”——这是李光耀六十二华诞时人们送给他的贺联。见《李光耀诚对中港台》第95页。



李光耀说,几十年来自己敢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因此,今天新加坡人人拥有屋子。图为李光耀于1965年12月8日来到国会大厦,出席第一届国会的开幕典礼。见《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第12页。

新加坡经验的推崇不难推测,中国从新加坡所获得的启示也不难想见。直到将近一年之后的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仍然不忘新加坡。他指出:“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①而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针对有的人说发展“三资”企业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所进行的批评,其思想仍然是上述新加坡经验的发扬光大。邓小平说:“我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律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①

第三，邓小平要求赶超新加坡，是对李光耀当年“挑战”的公开“回应”。李光耀经常谈起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的如下故事：当邓小平对李光耀称赞新加坡的巨大变化和建设成就时，李光耀回答说，谢谢你，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容易管理。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道，是啊，假如自己要管理的，只有上海这么一块地方多好啊！李光耀对邓小平的这番感叹不以为然。他用带有几分“激将”的口气说道：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是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因此，没有什么事情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由于李光耀是某种意义的“基因决定论”者和“文化决定论”者，即相信人类的智力很大程度是由遗传因素所决定，相信族群的命运很大程度是受文化传统所左右；也由于他对中国人力资源具有良好评价，对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亲切了解，所以，他对邓小平的这番“激将”就不是简单的即兴之言，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定见确论。对李光耀来说，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并不需要看到中国大陆崛起的现实，而是只要看到中国的辉煌历史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与新加坡国家的发展事实：既然中国的先人能够创造出如此伟大的文明，作为他们后裔的当代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既然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与新加坡国家能够做到，同是华人的中国大陆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在李光耀看来，中国大陆的崛起，只是时间的迟早，只待体制的转换。正如他在1974年会见印度领导人时所说的那样，他确信自己“对中国人的心理有一定的洞察力。中国人也许像印度人，心理上有一种奇特的拘谨的道德观念和物质主义的混合体。毛泽东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事，中国人民不会长期接受。……中国人非常讲究实际，能刻苦耐劳，有智慧。他们所要的一切是政治稳定和有利经济奖励的气候，使他们可以作出最大的贡献”。虽然当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低得可怜,只有2.5%”,但李光耀毫不犹豫地告诉印度领导人:“中国人民……迟早会靠刻苦耐劳脱出身来。……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向全世界证明,他们不光能同城市国家新加坡和香港等小地方竞争,甚至还能同日本竞争,取得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这样的日子不很远了。他们不需要依赖国家的拐杖,问题只是——我又回到自己的命题——最重要的是政治稳定,官僚信赖得过以及自由企业以社会为依归。”^①笔到此处,让我们回到李光耀与邓小平的那番对话:听了李光耀的“激将”言论,邓小平沉默不语,未作辩解,有关话题也就因此而轻轻带过。但是,邓小平没有忘记李光耀的“挑战”,李光耀也读懂了邓小平的沉默。当1992年邓小平南行时,他说要向新加坡学习,并且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李光耀后来告诉中国观众,这表示邓小平接受了自己在1978年的“挑战”。那就是新加坡能做得到的,中国能做得更好!

既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那样热忱称赞新加坡、强调借鉴新加坡和要求赶超新加坡,那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活力和廉洁的成功经验,我们是不是应该认真进行分析、切实加以研究呢?

本卷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奋力耕耘的一点成果。

^①参见《李资政21年前预言》,1995年6月11日《联合早报》。

活力篇



第一章

理性执政:带来变通力、稳定力

所谓理性执政,是指按照理性要求执掌政权。理性是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它注重立足实际、讲求效用,是为实用理性;它承认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或者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从而能够用谦卑的态度面对世界,用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是为渐进理性。它主张将一些一时不易弄清、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有害处的问题搁置一边,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于也不怀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并注重通过实践以获得真知,达成共识,是为实践理性。立足于实用理性,就不会拘泥于某种教条或模式,也能够打破条条和框框,从而具有变通力;立足于渐进理性和实践理性,就不会超越能力盲目冒进,也能够认识到“人生智识至此而穷”,将那些麻烦棘手的问题置于不议不论之列,从而具有稳定力。正是通过理性执政,人民行动党才能够运用实用理性而具有变通力,运用渐进理性、实践理性而具有稳定力。

第一节

变通力:以实用理性为基础

李光耀曾说,变是生活的本质。当人们停止了变,不能够对新的形势适

应、调整和有效地应付时，他就开始要死亡了。因此，成功的程度取决于能够预料到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决心和本领，对现在预料中的必要的变，开始作变革、调整和适应。实际上，人民行动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截然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该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能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人民行动党在理性执政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变通力，是以实用理性为基础。不同于希腊哲学的抽象思辨和印度哲学的追求解脱，儒家文化的性格特征表现为一种实用理性，其特点是注重实际，强调效用。身为华人的李光耀，其政治思维十分典型地体现了儒家实用理性。实际上，李光耀对儒家实用理性也有十分深刻的觉悟与觉察。他说：“儒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实际和理性的原则，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进展。”^①这里，李光耀实际上是将儒家实用理性分解为实际和理性等两方面原则。一方面，李光耀注重实际。当记者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②总之，李光耀从不相信任何理论光靠听来不错、写在纸上合符逻辑、言之成理，就一定能付诸实现。一切得看现实人生里发生什么些事，在社会上工作的人怎么过日子。无论何时何地，



李光耀说：“如果有一天，你再也不能适应，再也无法改变了，那就是你枯萎、凋谢的开始……就这么简单。假如有一天，我无法再学习新事物，并与世界脱节，我将变成废人。”图片题名“与时俱进”。见《李光耀 80 名言》第 29 页。

①《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第 412 页，现代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②《给新加坡留下一个好政府》，1995 年 5 月 1 日《联合早报》。